



十六位

旗人

妇女

的

口述历史

最后的记忆

中国口述历史丛书

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

中国口述历史丛书



最后的记忆

定宜庄 著

博 库

中国 · 美国 · 台湾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权 利 声 明

对从博库网(www.BOOK00.com.cn 和/或 www.BOOK00.com) 下载的作品,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博库公司(BOOK00, Inc.)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出版、复制、传输、发行、出租、播放、传播、展示、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或数字载体、印制、镜像、设立网站、上载、下载。未经博库公司(BOOK00, Inc.)许可,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还是非商业目的。

未经博库网的许可,任何人不得修改、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

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侵害、破坏。

“BOOK00”,“博库”及相关图形等为BOOK00, Inc. 的商标。

前言

本书辑录了十余名满族老年妇女亲口讲述的个人经历。她们绝大多数出生于本世纪初，正是清帝国刚刚崩溃的时候。

清朝的覆亡，使作为统治民族的满洲人经历了“从富贵与悠然的境地突然堕入贫穷”的巨大转变，痛苦自不待言。但多年来，他们的境遇不仅为所别人漠视，甚至他们自己也讳莫如深。如今重翻这段历史，我们似乎会突然发现，当年的旗人后裔，曾经历了何等样的辛酸，而妇女的遭遇尤其悲惨，据当年目击者的形容：

不必去观看新闻栏目，任何人今天都可以看到出身高贵的满人在拉洋车，他们的妇女被人雇为女佣，最悲惨的是，他们的姑娘过着不名誉的生活，其目的只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家庭的生存，众所周知，北平城里至少有七千妓妇，其中大部分是满族人。人们也知道，满人家里的姑娘和妇女们化装或者蒙上头在夜里拉洋车。

这个不幸的民族的妇女和儿童所经受的痛苦更甚于族中的男人……许多非常漂亮非常年轻的姑娘在妓院里卖身，天坛附近的天桥大多数的女艺人，说书人，算命打卦者都是满人。更有甚者，昔日权贵的女性后裔被迫卖给汉人当姨太太……据说前皇上的一个侄女下嫁了当地一家餐馆老板的儿子，代价只是给她父亲四千大洋……

在本书 16 名被访者的讲述中，对这些情况也有零星的反映，当然她们中的大多数已是这些妇女的女儿一辈，那是保存在她们记忆中的母

亲的故事。

女儿一辈的满族妇女自出生迄今又是八十余年，八十余年家国同运，这个民族经历的变化岂止一个“天翻地覆”能够形容！不同于曾在清朝享受过特权地位然后又突然陷入绝境的上一辈，她们这一代经历的，是一番“死而复生”的过程。我访问的这些满族妇女，绝大多数已是走出家门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她们或者脱离家庭投身革命，无论别人还是本人都一度忘记了自己的民族成分；或者在父兄都“落架”无望之时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在她们身上，不仅表现了男人也少见的顽强和坚忍，还鲜明地表现出满族妇女爽朗、泼辣和刚烈的气质。

在科技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如此急速、传统观念和传统文化消失得如此彻底的今天，我访问的这一代妇女所讲述、感受的一切，已经再不会被她们的女儿辈体会。满族这个民族还在，但残存在这些老人记忆中的、这个民族在一个已逝时代的生活、文化和观念，都在随着这些老人的离去而迅速消失，而且将一去不返，永远无法再回忆、再复制。这便是这本小书取名为“最后的记忆”的原因。

保留这些记忆，当然不是、至少不仅仅是为了描述和再现这个民族曾经历过的苦难，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说，满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与今天其他五十四个少数民族相比，有两个主要的不同点。其一，满族在近代经历了由一个统治民族向被“驱逐”民族再到被恢复平等地位的群体的曲折转变，从边缘到中心再到边缘的矛盾在这个民族身上表现得分外突出而且淋漓尽致。其二，满族建立的清朝曾经统治中国近 300 年，保留

有从未成为过中心的诸族不可能留存的浩繁的文献，即使是这些文盲、半文盲的、极少受到官方话语影响的下层普通妇女对于自身经历的口述，也几乎都可以与文献一一互补和互证。这样的两个特点，就使满族的口述史显得别具意义和价值，很有可能为族群的研究，寻找新的角度和层面。

通过对访谈对象和访谈计划的不断调整，我的访谈主题集中于这样三点：

1. 相对汉族而言，这些有着旗人背景的妇女，对于自己出身的民族是否具有、具有的是什么样的集体记忆。

2. 满妇女的生活、婚姻、生育状况与族际通婚情况。

3. 辛亥革命以后这些妇女的家庭变迁和个人的生活经历。

将我访问的这些妇女统称为“满族妇女”，只是为了行文上的方便，事实上将她们统称为“旗人后裔”，也许更为准确。由清朝的创建者努尔哈赤建立，并与有清一代相终始的八旗制度，特点之一是“以旗统人”，亦即将所有归附的或俘获的各民族、各部落人口，一并纳入八旗的组织之中，从此旗人成为满人的同义词，其间囊括的，不仅有建州、海西等明代女真后裔，还有大量汉人、蒙古人、朝鲜人及东北、北方各少数民族的人口。人口构成复杂，且多是通过强力被征服集聚在一起，就构成了满族这个于17世纪初新成立的人们共同体的显著特征。八旗中有满洲、蒙古与汉军之分，但在有清一代，他们都以“旗人”的身份将自己与广大汉族“民人”相区别，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满族的民族意识。

清代八旗，半数驻守京师，是为禁旅，禁旅中又有驻扎城内和城郊之分；另外半数分驻各省，是为驻防。而八旗驻防就其分布格局来说，又可大分为畿辅、各省及边疆三类，处于不同社会生活环境的旗人，在几百年大体不变的背景之下，逐渐形成了各自的特点。

正是鉴于满族共同体形成的这种复杂性，寻找尽可能多的来源和背景的旗人后裔，便构成我选择访谈对象的第一个出发点。在本书中，我访问的有如今自报满族的满洲八旗后裔，也有确系旗人后裔却因种种原因如今自报汉族或者蒙古族的，还有在清代纳入旗下而今天又恢复汉族成分的人，生活于不同环境和不同生活经历下的旗人妇女，表现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感，在强弱程度上有很大的差异，从她们对旗人、满族这些身份的态度，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满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多元性，以及“你来我去，我去你来，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特征。而通过这些口述，为探讨满族的民族意识、民族界限提供一些材料，正是本书的初衷。

清朝旗人，有宗室贵族与平民之分，有正身旗人与奴仆之分，而如今的研究者则或将目光停留在宗室亦即爱新觉罗家族的后裔身上，或者热衷于追踪满族中当今的名人，以至于社会乃至他们自己，都认为只有他们才是满族的代表和象征，是满族的代言人，而忘记了他们所能代表的只是满族的一个为数很小的特殊的群体。我虽然也选择了几个皇族与满族上层人士，但却以那些最普通的、默默无闻的下层妇女、甚至是不识字的妇女作为选择的重点，我希望这些访谈能够从尽可能广阔的层

面、尽量真实地反映出这一代妇女的人生历程和她们的生活态度。因为只有从这些获自民间妇女的资料与通常带有权力意识的和民族中心主义的正统知识的比较中，我们才可以重新认识被边缘化了的一些人物和日常事件，并找到新的意义。

口述历史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社会记忆’或‘活的历史’，它不一定是过去发生的事实，却反映了个人的认同、行为、记忆与社会结构间的关系。但迄今为止，口述史学的内容和意义在我国史学界还远未被人充分认识和了解，人们至多将它看成是在文献材料不足时的一种补充。而我在近几年孜孜于此的原因，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历史本身是复杂的、多元的，它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但历史上能够掌握话语霸权的，却总是官方和有特权者，当然也都是男性，他们将自己的声音凌驾于、笼罩于其它声音之上，让人们以为只有他们才能构成历史。由于他们关注的，基本上都是政治的和权力的斗争，他们编纂的文献便成为一系列政治制度兴废和权力交替的纪录和集成，而这些也便成为传统史学研究的主流，这不仅因为研究者主要是由上层社会的男人们组成，更由于史学研究的依据始终是由这些人记录的文献。口述史使那些不掌握话语霸权的人们，包括普通的下层群众、少数民族和妇女有了发出自己声音的可能，已经有史学家指出：“它对往事给予更为现实主义和公平的重建，对既定的叙述提出挑战。口述史对整个历史的社会使命持有激进的含义”。

口述史学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范围，在普通人的经历、行为以及他们

对这一切的记忆进入历史的记录，进入史学家的视线以后，历史研究正在变得比传统史学更丰富多彩，更有活力，更能够为广大的普通人接受，也就是说，更接近于历史上的真实。

英国历史学家卡尔也曾经说过：“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回答交流。”这正是历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对我来说，也是历史研究的乐趣所在。这种交流在口述史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史学家可以选择自己的访谈对象，而被访者也有表述自己意见的机会，这样相对公平的交流能够为历史研究带来活力，口述史的被访者既然都是活生生的个人，与通常史学家与冷冰冰的文献所进行的交流不同的是，它能够调动语言、感情、动作，更准确地提供当时当地的氛围，我一向认为，准确把握历史情境与氛围对于写作任何一部历史著作，都是必需的。而“找不到感觉”却正是如今很多史学著作的通病。

本书的每一篇访谈都是在录音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除了删掉一些重复处并将叙述的次序作了些调整以外，基本未作改动，可以以录音为证。为保证每篇访谈的完整性，凡访谈者的问话和插话也被悉数删去。

这本小书是我与被访的十六名女士共同努力的结果，她们不仅坦诚地给我讲述自己的故事，也予以我非常热情的款待，大多数人最后又披阅了整理后的访谈录并提出了修改和补充的意见，有些人还和我成了朋友，我首先应该感谢的当然是她们。

进行访谈不同于案头的研究，为了尽可能扩大被访者的范围，需要

了解各种各样的线索，要与各方面的人打交道，而这绝非终日呆坐于书斋如我者所擅长，感谢众多相识与不相识的朋友的多方相助，才使这本小书得以完成。除了在每篇之后的访谈者记中已经提到的以外，这里还要特别提到和补充的朋友如下：

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所的江桥女士曾陪我赴雄县北营村和其它一些村子调查满族现状和历史，还热心为我介绍了两名老人，本书中对鄂凌英女士、吴淑华女士以及安荣华女士的访谈，都是我们合作的成绩。她还帮助我为胡福贞女士所唱民歌记谱。江桥曾是我学习满语时的老师，后来师从王钟翰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又成为我的师妹，我的这些访谈，颇得力于她的鼓励和支持。

在我去年赴呼和浩特进行调查时，受到中央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佟鸿举和他祖母、外祖母两家的热情接待，小佟回京后又几次为我与毓臻女士联系，使我终于顺利完成了对毓女士的访谈。

福建驻防八旗后裔、中国科学院退休干部关炳铮先生曾热心陪我到雄县诸村，并为我安排食宿交通和接洽关系。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徐庭云教授为我推荐并陪我进行了对景双玉女士的访谈，还曾冒着大风沙同我一起造访了到京探亲的那清绪女士。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奇文瑛副教授积极为我提供线索、查找资料，陪同我进行了对赵秀英女士的访谈，她和她的母亲还为我在呼和浩特的工作提供了诸多方便。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胡鸿保博士认真阅读了全书并提出很多有

价值的建议，他还为我提供了大量国内外有关口述史的文章，我的这篇前言，也采用了我与他合作的文章中部分段落。

张寿崇先生不仅不遗余力陪我奔波，还仔细阅读了本书中的大多数文章，并为我详细解释了一些北京土语和北京旧俗。近几年来，我与张先生曾几次去京郊香山和大兴等地进行有关满族的民族调查工作，多有收获。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赖惠敏教授也曾仔细阅读全文并坦率提出意见和建议，并为本书的出版多方奔走。

为我提供线索、陪我进行访谈、帮我提供方便的，还有印红标、孙爱成、杨海英、张莉等朋友和同事，谨向诸位表示由衷的谢意。

定宜庄

1999年3月于北京

我妈老说：“我没得过皇恩”

——祁继红女士访谈录

访谈者：定宜庄、印红标

时间：1997年11月13日

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车道沟祁继红家

您是让我说我母亲、我们家里的事是吧？我姓祁，属狗的，民国十一年上生人，七十五周岁了，就是在北京出生的，原来我们在东城北池子住，属正黄旗。我妈说旗人都是东北过来的，根儿都是东北的，来了

就跑马占地，我也不懂得这句话。我为什么没报满族也是受我妈的影响，我妈老说：“我没得过皇恩。”还说这老旗人没多大意思。

1. 我母亲

我妈挺开朗的，我父亲常说：“别瞧我比她大十一，她什么都记得。”她文化大革命时死的。我哥哥在地质部工作，他过去当过督察，“文革”时因历史不清楚，1966年7月被轰到山西朔县，我妈受他的连累，也跟着去了。她是老北京人儿，觉得挺狼狈的，说：“人家那儿都有穿夹的了，我们还拿把大芭蕉扇，可现了，谁都瞅我们。”旗人一辈子就要这脸面。我妈要活着，这会儿算起来也该一百多岁了。

我妈老和我说，说得还怪可乐的，说“你们多好呀，有父母，我从小就没父亲，跟着你姥姥，受多大罪呀，从小就订了婚，你爸爸有什么能耐呀。”

我妈说我姥爷特精，她那会儿就是我姥爷教的，三字经，百家姓，什么女儿经，都念过。我姥爷人过义和团，穿着黄衣裳，好像有什么妖术似的，指哪儿就着哪儿，特神气。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我妈跟我姥姥逃难的时候我姥爷还在。

我姥爷是病死的，那会儿我姥姥才三十二岁，我妈十几岁，我姨四岁，我妈比我姨大十一。我姥姥就生了这俩闺女。她没有什么亲戚好友，守寡也没有主张，就净上我父亲这家来，求我们家帮助她关俸银、俸米，因为我姥爷那会儿跟我大爷他们都是朋友，莫逆之交，俸银俸米什么时候不关了我可说不清。反正我姥爷死了以后我姥姥说这大家庭挺

好，就求这儿吧，我妈说她那会儿才十几岁。有一次我姥姥就说“我带着你串个门儿去吧”，那会儿到人家还得叫婶婶大妈呢，我二大妈那人比较爽，就是没心眼儿，她就紧盯着我妈，摸摸我妈的辫子呀，看看呀，我妈比起我姥姥来就挺精的，回去就说：“妈，(那时我家就改叫妈，不叫额娘了，不过我妈结婚以后，这边还是管妈叫额娘，管爸叫阿玛。)我可告诉您啊，我可不给老祁家，您可别跟我身上打算盘，他们都比我大。”我父亲还比她大十一呢，她那些哥哥嫂子们可不是更大了么：“您求他们关钱，您可别拿我还愿。”我姥姥就说：“没有那么回事儿，就是带你串个门儿。”我妈那年才十六，果然是到十九岁就聘了，我姥姥说：“给的这婆家挺好的，我又没儿子，就你和你妹妹，我就依靠你了，我就希望给你我个大家庭，我也有个照应。”我姥姥那会儿不是孤单么。

这边儿一个公公一个婆婆，加我妈是妯娌仨。我妈不是去过吗，结婚时一拉盖头，一瞅，果然是那家儿。那会儿结了婚，得坐到第四天才能回门，我妈回去就和我姥姥闹，说：“果然你把我给了老祁家了，你看他那哥哥嫂子多精啊，就他傻，怎么把我给他！”其实我父亲也不傻，他就是憨厚，老被人家欺负。看我妈又哭又闹的，我姥姥就说：“那反正也把你给人家了，还有什么办法呀，没办法了。”我妈后来就和我说：“要是你姥爷活着呀，高低也不能给他们家。老祁家哥儿仨，就他最小，又没本事，就他是步营。”

2. 祖母一家

老祁家哥儿仨，我大爷、二大爷，我父亲最小。我就不知道我大爷

那会儿干吗，哥儿仨之中长子掌权，由我大爷过日子。他没儿没女，也没营生，一辈子身不能肩担手不能提篮，我奶奶死后留下点钱，他老说坐吃山空，就靠卖家产，卖一点吃一点，吃了十几年。我妈常说：“那会儿你奶奶留下的一点钱都让你大爷给放了秃尾巴鹰了。”秃尾巴鹰就是放了债一去不复返，让人给坑了。我大爷得的是喘病，才四十来岁就死了，死时满口的牙都没掉，头发一根白的都没有。

我二大爷比他强点，是个小排长什么的，那会儿照的相身上还带着刀么，后来是做小买卖。他有三个姑娘，我到今儿记着呢。他俩好像都比我父亲强，挺精的。

我们那时管奶奶叫太太，我奶奶的娘家是黄带子，那时候打官司，都不跪着。我奶奶六十岁就死了，为什么呢？那会儿的旗人就老把着自己的孩子，没出过门似的，四九城恨不能都不能出。我父亲那会儿当步营，头一次是开往廊坊，按说是挺近的，一听儿子走了，我奶奶就急得要命，她就东家去，西家去，告诉人家说我这小儿子要走了，上哪儿哪儿，晚上回来她就紧痰，就死了，刚刚六十，你说，就为这事儿！就刚到那儿，那功夫人家就告诉他，说你母亲死了，来了。



（清代旗人妇女的装束）

我妈嫁过来时是大家庭，妯娌仨都在一块，就属我妈小。她怀着我哥哥要生还没生，我奶奶就死了。我奶奶是在北池子死的。后来又搬到西城的鱼雁胡同，我就是在西城生的。我母亲不同意搬西城，她说穷西北城，干点什么都不发展，东城那边守着东安市场，抓挠点生意都好抓挠。到西城什么也别打算做了，穷。可是我父亲也他就折回就她小，她也做不 清代旗人妇女的装束了主。我大妈乐意搬西城，她娘家在西城。买的这西城的房是我大爷的钱，一个院儿，那时还在一起住，大娘和大爷当家。五间北房，最小的和最大的住三间，两边耳房是我二大爷住。那时候比较生活好一点的家家都有葡萄架，还有十几盆石榴，一边八盆两溜，我记得我家比我婆家强，摆设都挺好的，还有冰箱、条案、八仙桌，每天还要窖冰。一边一个立柜，还有柜塞子，搁着钟啊，都是花梨

紫檀的。后来分家才把这些卖了。我大妈的屋比我们屋更好点，都是榆木擦漆的，红的，亮着呢。我妈这屋就黑了吧几的，搁着大躺箱，可能装东西了。自从鱼雁胡同的房卖了，就把家具也都卖了。没地儿搁了。

住西城那房的时候我们就自己单吃了，有老太太活着能够团着，老儿子得益，没有奶奶，没人过日子了，哥儿兄弟就不成了，没多少日子，三一三十一，就分家另过了，哥儿仨谁也不管谁，我妈也吃了不少委屈。我们就搬到对门那院去了，还是鱼雁胡同，我大爷跟我们隔着一堵墙，挨着。都是老街坊，住人家的房。一直住了几年，后来又搬到冰窖胡同，在南小街，也是西城，又住了十几年，我和我姐姐都是在那儿结的婚。

我父亲结婚时三十了。那会儿男的结婚都得二十七八，女的十九、二十。一般农村的早，到城里就都是二十七八。我父亲因为是步营，挣的钱也少。我妈说就是他那会儿“勺道，”就是不严肃的意思，岁数大了还像小孩似的，爱跟孩子一起玩，没个大人气，没正形儿，又搭上没能耐，就没人愿意把姑娘给他。

我父亲就是步营，他上哪儿吃俸银俸米去？二十六年听说把外国也打得够呛，咱们北京旗人都练武，哪个都讲武术。大爷二大爷都会，别看干活懒，这都不懒。我父亲考步营，也是凭拉弓考的。我大爷他们都养活鸟儿，没事儿就拿着鸟笼子，去茶馆喝茶去。见天儿得花十几个子儿，挺爱议论各种事儿的，买鸟儿也不少钱呢。我妈说是有人出主意什么也不让这伙人干，就养着这伙人，实际是害了这伙人。我大爷、二大爷都念了十几年的书，到我父亲他又傻，小时候又出(天)花，有细白麻

子，就不供他上学了。

后来步营就没啦，散了，那时好像是有了我了吧。我父亲好喝酒，走到南河沿，把脚崴了，我妈说从那他忌了酒。

步营散了，我父亲就做小买卖为生，做买卖也不容易，过去都讲究俸银俸米关着，皇上养着，到没地儿拿钱去的时候，喊也喊不出来，比如卖糖葫芦，叫不出这糖葫芦的名儿来，顶好的也就在墙旮旯没人的地方喊一声，一有了人又不喊了，嫌寒碜，也不容易，哪儿像现在的年轻人，多能喊啊，倒饬得多漂亮，都能喊出来。

那会儿找工作特困难，穷人太多，找不着工作，找工作的都是南方人，我们管他们叫“豆皮子。”他们来到咱们这儿，就特鬼，特机灵，咱们吃不了的苦人家吃得了。从他们来了，买东西都拿着秤，差一点都不要，咱们北方人、旗人穷大方，没有跟人家争过，给多少就是多少。

我父亲先做买卖，后来我姨给他找了个工作，在政委会当茶役，提个茶倒个水的，我父亲就说：“别瞧我做买卖，但是我是掌柜的，我给人拿东西，这侍候人的事我还真不行。”那会儿当茶役的都得给职员打手巾把儿，他不懂得，就把手巾拧成团递给人家，有那好的职员就说：“老祁，看你这样儿，你也没外头工作过，我教你怎么递，你得把手巾抖搂开了，这么递。”我父亲几次回家都说我不干了，干这侍候人的事我觉得特难受，我还是做我那买卖吧。我妈就说，如今孩子们都大了，再做小买卖人家都瞧不起你，儿子还怎么娶媳妇儿呀，你就做着去吧。做了几年，日本在北京八年，胜利又是四年，我哥哥就说别干了，在家